遲到不遲到？時刻的文化感知

■郭文華

在文學中時間或許是不可捉摸的書寫對象，但現代社會卻悄悄地在文人騷客的悲歎中賦予它兩種面貌──光陰與時刻，並據此刻劃我們的生活節奏。在〈現代社會的韻律與時間〉（本刊今年六月號），筆者已談過現代社會「時間就是金錢」的邏輯，本篇把重點放在時刻，談談它對生活感知的影響。

的確，古往今來人類渴求的不只是更多的時間，而且希望能掌握時光的推移。如果說「節約光陰」是對時間量的渴求，那「留住當下」便是對它質的期許。比方說，在閒談中不是常有如果「回到當時」之類的感嘆？而歌德的名著《浮士德》詩劇正是這類願望的典型。

劇中主角浮士德是窮究學問的老博士，感嘆知識的虛無。於是魔鬼梅菲斯特化身爲修道士，跟老人訂下弔詭的約定，自稱願委身爲僕，讓浮士德再青春一次，條件是：在他獲得滿足的那一剎那，靈魂就要歸於魔鬼。浮士德答應了，成爲翩翩少年，遊戲人間，在欲望與權力之間遊走。浮士德在耗盡青春所換得的偉業前，終於感嘆「眞美啊！請停留一下！」於是倒地而死。魔鬼終究不許他在人生協奏曲的絢麗獨奏段落中多做停留。

當然，理性時代的歌德終究還是給浮士德美好的結局，但現實人生卻不如此。我們不但常覺得「生不逢時」，更抱怨「時不我予」。到底時刻用什麼方式塑造我們對時間的感覺？且讓我們以「準時」與「遲到」的觀念爲例，看看進入同步的全球社會後，時間刻劃是如何滲入現代人的生活意識。

在刻度精細的計時器剛剛引進之時，催促上工的汽笛與鐘聲往往象徵工廠對職工的控制。工人沒有儀器掌握時間，而生活作息也不如以往自由自在。但當工人習慣放工休息的汽笛聲響或鐘錶報時後，它變成工人爭取工資與工時的參考，也成爲切劃生活的座標。準時成爲新生活的道德，遲到則是莫大的罪惡。

準時上班，是爲了要準時下班；準時上課，是爲了要準時下課。我們要揚棄遲到，因爲它浪費的時間是社會的公共財。不過我們也不鼓勵以往的「早到」文化，在忙裡偷閒的等待中享受自我主宰的生活規律。它有種「偷得浮生」的小小罪惡感，因爲虛擲自己的寶貴時間形同是生活上的不道德與不自律。因此，每個人彷彿都有滿滿的行程表，排工作，排休息，擠得沒有一絲空隙。在算計光陰之餘，忙碌的現代人爭取的是一種現代感下的時時刻刻。它由時刻表上的短短交集所定義；人不欠我，我不欠人。

在標榜準時的現代國家中，日本是一個神話。日本的大眾運輸有全世界最複雜的時刻表，但它也最準時：不論長程短程，誤差只以分計。甚至高速公路每隔一段就顯示目前交通狀況與預計延誤的時間，清清楚楚。一位日本朋友這樣自豪：「我們有最好的科技讓你找不出理由遲到。」日本人的勤奮守法固然早已久聞，但難以想像的是一百年前日本也曾是很不守時的國家。

一八七五年以前日本以日頭爲準，用不定時法劃出日間與夜間，直到明治維新西洋技師發現在地工匠不準時，才要他們採用新的計時法。引進新式技術後，日本成爲以嚴苛的自我控制爲特色的社會。

以火車來說，鐵路公司有一套運轉交接的程序以確保每個步驟的時刻掌握，此外它對誤點採取重罰制度，要求員工對出勤時刻嚴格記錄，遲到者則罰款。這種規訓也發生在工廠。明治時期的工廠以鐘聲要求工人準時進廠，時刻一過就關門。但考慮到工人通勤不易，因此有一段緩衝時間，以笛聲爲記。這段時間

從原先的半小時到十五分鐘再進至十分鐘，愈來愈緊張。

而在泰勒的科學管理法引進之後，鬆散的時間管理變成急需改正的「文化病」，是日本無法跟隨歐美的理由。如一九二〇年代主導海軍工廠的伍堂卓雄所指出的，日本工人對工作與休息沒有明顯區分，與「進步的」歐美明顯地不同。歐美的工人工作時勤奮工作，休息時充分休息。

伍堂的評論透露出兩個訊息：第一、日本人並非我們所想的那樣天生守時；傳統日本就像其他的農業社會一樣有自己的生活步調。其次，伍堂讚許的歐美模式，與其說是歐美的特徵，倒不如說是現代世界「時刻嚴守」的特徵！

正如同其他物事一般，日本學習「現代化」十分澈底，視爲「肉體改造」的社會運動，最後甚至超越他們心目中理想的歐美。以時間管理來說，一九三〇年上野陽一批評日本比歐美落後50年，政府因此制定無數法律，約束公務員在處理公務上每個動作所花費的時間。此外，從一九二〇年開始官方舉辦「時的展覽會」，具體制定各種公約來規範各種場合下所應有的「正確時間觀」。同時他們更透過各種社會組織，如時間勵行會或愛時間同盟等，集會倡導守時精神。

守時成爲這波社會改造的中心，而它也逐漸內化成爲日本人自豪的民族特質。它不但塑造出脫亞入歐的民族形象，還藉由其在殖民地的推動，增強現代國家的一體感與殖民者、被殖民者的優劣差異。

說到這裡，也讓我們看看台灣在現代化過程中時刻的點點滴滴。日本自領台後，引進在內地才實行不久的時刻制度，如隨季節變化而變的官僚與學校作息表、規律的鐵路時刻系統與工廠規則等，但並未整合。直到第一次臨時人口普查，因爲必須在十月一日零時起同時實施，標準時刻的「同步」功能才彰顯出來。雖然如此，除部分勞動者與商人外，這些規範對一般人沒什麼影響，畢竟天高皇帝遠。

台灣生活規律的強化與重組，是在皇民化運動後以日本人精神的面貌登場。以改造爲名，它與放足、改姓等價值並列，把他們認爲生性「疏懶」的台灣人加以動員。透過新式的教育體系，這些繁雜的生活起居規則不但讓台灣人動作劃一，效率提高，符合戰爭的人力需求。另一方面，經由這些規則，日本人也塑造出「皇國國民」的形象。時刻不僅讓台灣社會加速現代化，在這過程中它也展現出當地人與統治者的差異與權力關係。

到了戰後，時刻以另一種方式與政治應和。在日治時期，台灣使用相對於帝國中央的西部標準時間，直到一九三七年才與其他地方同步。國民政府播遷後，這個時間被改成中原標準時間，與廣大卻只有單一時區的中國大陸相同。不僅如此，與戰爭效率的提升息息相關的日光節約時間，也在戰後迅速引進到低緯度的台灣，時續時停，直到一九八〇年代初才宣告結束，彷彿是解嚴的先聲。

而相對於敏感的政治氣氛，台灣社會卻徹頭徹尾栽入現代社會的時刻框架中，突飛猛進。戰後初期台灣人對隨國府來台者在時刻上的「脫序」的驚訝與衝突，已慢慢撫平。新一代台灣人的政治態度或許曖昧，但生活上可毫不含糊，與其他現代社會大致相同。不管喜不喜歡，台灣島民都得在時刻的共同結構下一同呼吸與生活。

的確，不論台灣或日本，現在大多數人過的其實是超越地域，由各種時刻所建構的「全球化」生活。從職員八小時的工作時間、三班制的輪班，到生活上的種種細節：兩小時左右，有上下半場休息十五分鐘的音樂會、一張約六十分鐘的雷射唱片、兩小時左右的電影、甚至是國際航線上的兩頓餐點等。作爲現代社會的一種產物，時刻構成了生活的骨幹。它是「彈性生活」的參考座標，也塑造大家的生活感覺。

現代版的「浮士德」故事或許是這樣：剛看完精彩電影，還沈醉在劇中場景之際，沒有鉤人靈魂的梅菲斯特，飄入耳中的話語卻是：「下一場即將開始，尚未離場的觀眾請儘速離場。在離開前請別忘記您的隨身物品。謝謝您的合作。」

於是我們迅速起身，整理心情，下個約會正等著呢！可別遲到了。 □

郭文華
陽明大學通識教育中心